

平台经济下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与身份认同的跨国比较研究

马悦媛¹ 闫浩轩² 高雨琪³ 李宇钊¹

1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2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朝分实验学校

DOI:10.12238/pe.v3i5.16605

[摘要] 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将外卖骑手这一新兴劳动群体推至学术与公共讨论的前沿。本研究基于对多个国家外卖骑手劳动现状的二手资料,采用跨国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全球平台资本逻辑与地方社会经济制度情境的互动如何共同塑造骑手的劳动过程、不稳定体验与身份建构。研究发现,尽管各国骑手均面临由“灵活性话语”掩盖的算法控制、劳动风险外化与社会保障缺失等普遍困境,但其具体的劳动体验与能动性策略表现出显著差异。在发展中国家,骑手的核心挑战集中于人身安全与基本生存保障;而在发达国家,则更多表现为对算法公正性、结构性不平等权利层面的诉求。骑手的应对策略也呈现出从个体适应、非正式社群互助到正式集体行动的光谱,其形态深刻反映了各国不同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研究认为,破解平台经济的“灵活陷阱”,需要超越单一视角,构建政府、平台与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框架,以实现劳动者权益保障与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

[关键词] 平台经济; 外卖骑手; 劳动过程; 职业认同; 社会认同; 跨国比较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bor Proces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of Food Delivery Ride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Yueyuan Ma¹ Haoxuan Yan² Yuqi Gao³ Yuzhao Li¹

1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2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Tongzhou District

3 RCF Experimental School,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Abstract]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thrust food delivery riders, an emerging labor group, into the forefront of academic and public discourse. Based on secondary data regarding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food delivery riders in multiple countries, this study employs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interplay between global platform capital logic and local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al contexts collectively shapes riders' labor processes, experiences of precarit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while riders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face universal challenges—such as algorithmic control masked by a "discourse of flexibility," the externalization of occupational risks, and a lack of social protection—their concrete labor experiences and agency-driven strategies exhibit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re challenges for riders concentrate on physical safety and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wherea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struggles more often manifest as demands for algorithmic fairness and addressing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Riders' coping strategies also span a spectrum, ranging from individual adaptation and informal community mutual aid to formal collective action, with their specific forms deeply reflecting the distinc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each countr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ddressing the "flexibility trap"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requires moving beyond a singular perspective and constructing a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framework involving government, platforms, and civil society to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Key words] Platform Economy; Food Delivery Riders; Labor Proces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席卷全球,深刻重塑了传统产业形态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其中,外卖配送行业作为其典型代表,已成为全球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数以百万计的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构成了这一新兴业态的底层劳动力支柱。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仅是平台经济下新型劳动关系的缩影,更是一张棱镜,折射出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与独特的社会结构性矛盾。

平台企业普遍以“自由”与“灵活”作为核心话语,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入这一领域。骑手似乎可以摆脱传统雇佣关系中固定的工作时间与僵化的科层管理,成为“自己的老板”。然而,学术界与媒体的广泛报道揭示了这一美好叙事背后的复杂现实:算法的隐性控制、收入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的系统性缺失以及高强度的劳动风险,共同构成了一种被称为“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r)的新型困境。这种“灵活性”与“不稳定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是理解平台劳动者生存状态的核心。

尽管现有研究已对平台劳动者的处境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多集中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缺乏系统的跨国比较视野。平台资本的逻辑具有全球普遍性,但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实践,必然受到当地法律制度、劳动力市场结构、社会文化乃至城市基础设施的深刻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核心研究问题:全球性的平台资本逻辑如何与地方性的社会经济及制度情境相互作用,从而塑造了不同国家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生活体验与身份认同?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研究旨在超越对平台经济的泛化批判,揭示其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差异化表现,并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劳动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1.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为构建分析框架,本研究将引入“职业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探讨外卖骑手在平台经济下的身份建构过程。这一框架关注骑手如何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形成对自身职业的认知,以及他们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互动中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

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关注的是骑手如何在被普遍标签为“低技能”的劳动中,建构自身的专业性与能力感。尽管平台试图将劳动过程标准化与“去技能化”,但骑手在实践中依然发展出算法无法完全替代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例如对城市地理的深度理解、规划最优路线的直觉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技巧。通过淬炼和运用这些知识,骑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夺回对劳动过程的掌控,并在单调的劳动中找到职业尊严与自我价值,从而形成独特的职业社群认同。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则聚焦于骑手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如何被外部世界所看待。这一视角有助于分析骑手普遍面临的边缘化、污名化与制度性忽视等困境。他们的社会身份常常在“城市贡献者”与“交通违规者”的矛盾形象中摇摆,并且深受种族、移民身份、性别等社会结构性因素

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他们获得社会尊重与制度保障的差异化体验。

通过审视职业认同的内部建构与社会认同的外部压力之间的动态互动,本研究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全球不同国家的骑手如何在其独特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充满张力的身份协商与日常生活实践。

1.3 研究设计与论文结构

本研究采用定性的跨国比较分析方法,以多国骑手研究论文为基础,通过对各国骑手劳动现状的系统性梳理,本研究将提炼出平台控制的普遍逻辑与因地制宜的差异化表现。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剖析平台控制的普遍逻辑,这是骑手面对的普遍环境。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将转向骑手的主观视角,探讨其在不稳定的劳动体验中如何进行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建构。第四部分将结合不同国家情境,深入探讨骑手面临的差异化挑战及其多样化的能动性策略。最后,第五部分为总结部分,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反思与政策建议。

2 全球的一致性:平台控制的普遍逻辑与被建构的“自主”

尽管外卖平台在不同国家的运营策略有所差异,但其底层的劳动控制逻辑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平台通过精心建构的“自主”话语吸引劳动力,再以不透明的算法系统进行隐性控制,并通过法律身份的界定将风险与责任完全转嫁给骑手个体。

2.1 “灵活自主”的承诺与现实矛盾

平台吸引劳动力的首要策略,是普遍宣传外卖配送工作的“灵活性”与“自由度”。这种话语精准地迎合了特定群体的需求:拉脱维亚的学生、父母或创业者利用这种灵活性协调其多元社会角色;^[1]美国的女性则借此兼顾家庭照顾责任;^[2]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则被其不受传统雇佣合同束缚的特点所吸引。^[3]一位美国骑手“工作很糟糕,但我喜欢这份工作的自由”的表述,生动地揭示了这种话语的强大吸引力。^[2]

然而,这种话语的建构并非仅仅是陈述事实,更是一种主动的意识形态塑造。在匈牙利,平台将配送工作描绘为“城市探险”与“健身挑战”,并把骑手定义为“个体企业家”,从而强化其“自主掌控收入”的认知,弱化其“劳动者”身份。^[4]在瑞典,平台同样通过“男性化话语”,将工作包装为适合运动爱好者的“自由职业”,以此吸引男性移民群体。^[5]这种话语策略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劳动者内化平台所设定的规则,将收入波动、劳动风险等问题归因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或“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从而消解平台的雇主责任。

这种被建构的“自主”与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拉脱维亚骑手的处境是这一矛盾的绝佳注脚:“表面自主但实际受控”。骑手虽然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但其工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从接单、取餐到配送——都受到算法的严密监控与规训。这种自由,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只能在平台划定的框架内进行的有限自由。

2.2 算法的隐形控制

算法是平台实现“实际受控”的核心工具。它构成了一套精密、高效且去人格化的新型劳动控制体系。

首先,算法的不透明性制造了持续的不确定性。骑手无法预测自己的订单量和收入,算法的分配逻辑完全是一个“黑箱”,骑手只能依靠猜测来规划工作,凭经验判断“高峰时段”。^{[6][7]}这种由平台精心维持的不透明性,剥夺了劳动者的知情权,使其无法进行理性的风险评估与生涯规划,从而强化了其对平台的依赖。这并非技术的局限,而是一种管理策略:一个可预测的系统会让劳动者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不确定性则是一种有效的纪律工具。

其次,绩效指标与游戏化机制驱动着自我剥削。平台通过一系列量化指标来评估和控制骑手。例如,拉脱维亚的客户评分和英国的“接受率”直接影响骑手的订单分配与收入。在越南和南非,严苛的“超时惩罚机制”迫使骑手为赶时间而频繁违反交通规则。^{[8][9]}西班牙的平台则更进一步,采用“游戏化”策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奖励、依据评分选择工作时段等方式,引导骑手深度融入算法框架,在“玩游戏”的体验中实现高强度的自我驱动与自我剥削。^[10]

最后,“独立承包商”的法律身份完成了风险外化。将骑手归类为“自雇者”或“独立承包商”,是全球平台企业通行的法律策略。在英国、瑞典、荷兰、南非等国,这一身份界定意味着平台无需为骑手提供社会保险、带薪休假、职业伤害赔偿等任何传统雇主应承担的福利与保障。骑手必须自行承担交通工具、燃油、维修、通讯乃至人身意外等所有运营成本与风险。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平台在享受骑手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同时,将所有与之相关的风险与成本都成功地转移到了最脆弱的个体劳动者身上。

从技术控制到意识形态的塑造,平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其控制的最高明之处,并非仅仅在于代码的强制性,而在于它成功地将一种高度控制的劳动关系,包装成了劳动者主动选择的“自由”生活方式。当匈牙利的骑手将高强度的体力消耗理解为“体育训练”时,平台的控制便实现了其最有效的形态——劳动者的自我规训。

3 不稳定性的劳动体验:劳动过程与身份建构

在平台自上而下的控制逻辑之下,是骑手自下而上的、充满矛盾与挣扎的日常生活体验。他们一方面在被普遍认为“低技能”的劳动中,努力淬炼专业知识以寻求职业认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社会的边缘化与污名化中,艰难地重构自身的社会身份。

3.1 职业认同:在“去技能化”劳动中练就的特殊技能

尽管外卖配送工作常被贴上“低技能”、“无门槛”的标签,但骑手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高度情境化、无法被算法完全替代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种知识的积累与运用,成为他们构建职业认同和专业能力的重要源泉。

在意大利,骑手为了在速度、安全与餐品完好之间达成平衡,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技能体系。他们不仅在脑海中构建了基于

城市交通节点的“实践参考心理地图”,以规划最优配送路线,还掌握了诸如“利用公交车作为保护屏障”等隐性的安全技巧。^[11]在马来西亚,骑手通过不断优化路线和提升沟通技巧,增强了对自身职业能力的认同。^[3]同样,在南非,骑手对城市地理与生活节奏的深刻理解,成为其选择订单密集区域、规避拥堵路段以提升收入效率的核心竞争力。^[9]

这些在劳动过程中生成的、具身化的知识,构成了骑手职业能力核心。它不仅是对平台“去技能化”趋势的一种反抗,也成为骑手群体内部界定“专业”与“非专业”、衡量合格从业者的关键标准。通过掌握和运用这些技能,骑手在一定程度上夺回了对劳动过程的部分控制权,并在单调重复的劳动中找到一丝专业主义的慰藉与尊严。

3.2 社会认同:社会边缘化与污名下的挣扎

与在职业社群内部努力构建的专业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骑手在更广泛的社会场域中普遍面临着边缘化、污名化与制度性忽视的困境。他们的工作具有极高的城市可见性,但他们的劳动价值与个体尊严却常常处于“社会隐形”的状态。

这种困境首先体现在公众的负面认知中。在意大利,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如自行车道)的缺失,骑手常常被迫违反交通规则,从而在公众眼中被视为“违规者”。在马来西亚,部分骑手的危险驾驶行为也导致了社会对整个群体的负面印象。在英国,这种污名化甚至演变为直接的语言暴力与歧视,骑手在外出时甚至需要避免穿着工作服,以免招致路人骚扰。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城市居民享受着外卖带来的便利,却往往将维持这种便利所必需的劳动过程(如赶时间、抢道)视为一种社会滋扰。

其次,这种社会认同的困境在交叉性因素的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种族与移民身份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关键变量。在美国,拉丁裔外卖骑手被主流社会视为“低技能劳动力”,不仅面临抢劫等街头暴力,还会遭遇警察反应迟缓等制度性忽视。^[12]在英国,少数族裔和黑人骑手除了要应对普遍的歧视,还需克服语言障碍、学历不被认同等额外的社会融入难题。^[13]南非的情况同样如此,来自邻国的黑人移民骑手比本地骑手更容易遭遇平台歧视与社会暴力。^[9]性别同样塑造了差异化的体验。美国的部分女性骑手表示,一些男性顾客存在“性别特权”观念,将她们视为仆人或性对象。有趣的是,这些女性骑手并未因此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平等诉求,反而将通过有偿劳动延续传统家庭角色视为一种“女性意识”的实现。这反映了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如何通过对传统性别分工的再诠释来寻求自我价值的复杂过程。

骑手们身处一种“超可见”与“社会隐形”的悖论之中。他们的身影遍布城市,是现代都市景观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劳动条件、个人故事乃至基本的人身安全,却往往被社会所忽视。他们的存在被功能化、工具化,被视为传递商品的媒介,而非拥有丰富社会关系和情感需求的劳动者。这种深刻的社会疏离感,正是驱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社群联结与身份重构的根本原因。

表1 部分国家外卖骑手状况、挑战与能动性策略比较

国家	主要骑手群体	核心挑战	主要能动性形式
越南	年轻男性、低学历者、国内移民	极高的交通事故风险；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平台超时惩罚机制带来的巨大压力。	个体层面的被动适应(如利用本地路况知识规划捷径)；缺乏集体行动。
南非	本地青年、邻国黑人移民	平台精细化算法控制；高昂的运营成本；移民群体面临的种族歧视与街头暴力。	强烈的个体能动性(地理知识运用)；非正式社群互助(WhatsApp 群组)；身份与技术博弈(租让账号、集体罢工)。
瑞典	移民男性、学生	薪资水平极低；被排除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平台“男性化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	正式的集体行动(通过工会达成集体协议)；社交网络信息共享。
美国	多元化, 女性与拉丁裔占比较高	平台福利缺失；算法不公；鲜明的阶级愤懑；种族与性别歧视。	广泛依赖社交软件(WhatsApp, Facebook)构建强大的互助网络与身份认同社群。
英国	移民(尤其是少数族裔)占比较高	算法“黑箱”导致收入极不稳定；社会污名化与歧视；制度性分化(合法身份与零工骑手)。	群体内部分化；零工骑手依赖社区互助, 合法骑手通过工会组织争取权益。
西班牙	本地青年、移民	与算法的复杂博弈(既寻求认可又主动规避)；劳动契约类型(受薪 vs. 自雇)导致认同分化。	独特的“参与性主体性”(与算法互动)；通过社交媒体(YouTube)构建多元职业形象。
匈牙利	年轻男性(职业过渡期、学生、移民)	低薪、无保障、高成本；平台“自由”“企业家”话语的掩盖。	心理层面的自我调适(将劳动“体育化”)；非正式社交互助(Facebook 群组)；身份疏离。

4 情境化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制度与社会文化

平台资本的控制逻辑虽具有全球普遍性,但其引发的矛盾、骑手面临的具体困境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却深刻地嵌入在各国的制度与社会文化情境之中。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全球联动与地方差异并存的复杂图景。

为了系统地呈现这种差异,下表对部分国家的骑手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4.1 劳动风险的“南北差异”：生存安全与权利不平等

从上表的比较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明显的劳动风险“南北差异”。在以越南、南非、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骑手面临的核心挑战更偏向于基础的生存安全层面。在越南,超过半数的骑手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至少一次交通事故,这与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恶劣天气以及平台为追求效率而施加的巨大压力直接相关。在马来西亚,超过60%的骑手没有储蓄,超过半数没有个人保险,外卖工作是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唯一途径。在南非,高失业率的宏观经济背景使得外卖配送成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激烈的行业竞争进一步压低了本已微薄的收入。在这些国家,骑手的斗争首先是一场关于人身安全和经济生存的斗争。

相比之下,在以瑞典、英国、荷兰、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尽管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同样存在,但骑手的诉求更多地集中在权利保障与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上。在瑞典和荷兰,核心矛盾在于平台如何利用“独立承包商”的法律身份,巧妙地规避了国家健全的福利与劳动保护体系,创造出一个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在英国,骑手的抗争焦点是要求平台公开算法,争取“算法正义”。在美国和英国,种族、移民身份等因素如何加剧了群体内部的不平等,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些国家,骑手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更高的收入,更是为了获得应有的劳动权益、社会尊重和制度性保障。

4.2 从适应到抗争：骑手的不同应对方式

面对不同的困境,各国骑手展现了从个体适应到集体抗争的广阔能动性光谱。这些能动性的具体形式,深刻地反映了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源。

个体适应与日常抗争是最普遍的策略。这包括西班牙骑手通过反复登录退出以调整工作区域,或利用信号盲区来“戏耍”算法;^[14]意大利和马来西亚骑手利用默会知识优化路线,在微观层面夺回对劳动节奏的掌控;^[15]以及匈牙利骑手通过将高强度劳动心理调适为“体育锻炼”,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自我赋权。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行为,实质上是在严密控制的系统内开辟自主空间的日常抗争。

非正式社群网络是骑手能动性的中坚力量。在美国、南非、荷兰等地,WhatsApp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成为骑手构建跨越地理限制的“虚拟社区”的关键工具。在这些群组中,骑手们分享实用技巧、预警交通危险、交流对抗平台不公的经验,并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对于美国的拉丁裔移民骑手而言,这些社群甚至成为连接母国、维系文化归属感的重要纽带。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形态,以其灵活性和低成本,成为原子化劳动者实现团结互助的最有效途径。

正式的集体行动则更多出现在拥有较强工会传统或法律保障的国家。在瑞典,运输工人联盟成功地与平台达成了集体协议,改善了部分骑手的薪资与保障。在英国,拥有合法身份的骑手也通过工会组织与集体行动来争取权益。^{[16][17]}然而,这类正式抗争的覆盖范围往往有限,且常常因骑手“自雇者”的法律身份而面临组织与谈判的巨大困难。

骑手能动性的选择,仿佛是其所在国家制度环境的一面镜子。在越南这样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公民社会力量较弱的环境中,骑手的能动性主要停留在个体被动适应的层面。在美国这样工会力量相对衰落但公民社会发达的国家,能动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基于社交媒体的社群组织。而在瑞典这样具有社团主义传统的国家,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则成为一种可能的路径。这表明,对外卖骑手权益的干预与支持,必须充分考虑各国的制度差异,采取情境化的策略。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全球多个国家外卖骑手劳动现状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平台经济下新型劳动关系的核心特征。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外卖骑手的劳动体验,是在全球统一的平台资本逻辑与高度差异化的地方制度情境之间持续博弈的产物。一方面,平台控制的逻辑具有普遍性。全球范围内的平台企业都通过建构“灵活自主”的话语来吸引和管理劳动力,同时利用不透明的算法系统进行精细化的隐性控制,并通过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来系统性外化经营风险与社会责任。这导致了骑手普遍面临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劳动强度高、职业价值被低估等共同困境。另一方面,骑手所经历的不稳定性的具体形态,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表现出显著的国别差异。

本研究识别出一种劳动风险的“南北差异”:发展中国家的骑手更聚焦于人身安全与经济生存等基本问题,而发达国家的骑手则更多地围绕算法公正、劳动权益与结构性不平等议题展开博弈。与此相应,骑手的能动性也呈现出从个体适应、非正式社群互助到正式集体行动的光谱,其主导形态深刻地反映了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工会力量与社会文化传统。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系统的跨国比较,为数字劳动研究提供了更为精细的分析视角。首先,研究挑战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指出算法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嵌入特定资本积累逻辑与管理意识形态的社会技术系统。其次,研究表明,全球化的平台资本并不会抹平地方差异,反而会利用、适应甚至加剧各国原有的社

会不平等结构(如种族、移民、城乡差距等)。平台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交织的辩证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改善外卖骑手的劳动处境需要一个超越“平台-骑手”二元对立的、多方协同的治理框架。

政府层面强化制度供给与监管责任。应尽快修订劳动法规,为平台劳动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法律身份类别,既承认其工作的灵活性,又保障其享有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工伤赔偿、集体谈判权等核心劳动权益;推动算法透明与问责,建立针对平台算法的监管机制,要求平台公开其订单分配、计酬和评价的核心规则,并设立由真人主导的、独立的申诉与仲裁渠道,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与申诉权;实施情境化干预,针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将改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加强道路安全执法作为优先事项。针对发达国家,则应着力填补法律漏洞,防止平台经济侵蚀国家福利体系的根基。同时,应为移民、少数族裔等弱势骑手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语言培训、法律援助与反歧视保护。

平台层面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优化算法方面设计平台应在算法设计中融入更多人性化考量,例如,取消极端惩罚机制,合理评估配送时间,将恶劣天气、交通拥堵等不可控因素纳入考量;承担保障责任方面,平台应主动为骑手提供必要的安全装备(如头盔、反光衣)、购买商业意外保险,并建立完善的安全培训体系;在建立协商机制方面平台应放弃对抗姿态,建立与骑手代表或工会组织的常态化沟通与协商机制,实现算法与政策的共同决定。

社会与消费者层面,应提升公共认知与伦理消费;消解职业污名,媒体与社会组织应积极宣传外卖骑手对城市正常运转的巨大贡献,消除对其“低技能”、“违规者”的刻板印象,营造包容与尊重的社会氛围;引导理性评价,引导消费者认识到,每一次“准时达”背后都可能隐藏着骑手的安全风险。在评价体系中,应将因餐厅出餐慢、交通拥堵等非骑手原因造成的延误与骑手自身的服务态度区分开来。

骑手群体层面为加强组织化与能力建设;强化社群联结,骑手应继续利用线上社交网络与线下聚会,巩固和扩大互助网络,分享信息,抱团取暖;提升维权意识,鼓励和支持骑手通过工会、劳动者中心等组织,学习劳动法律知识,提升集体谈判与合法维权的能力。

总之,破解平台经济带来的“灵活陷阱”,无法依靠任何单一主体的努力。唯有通过政府的有效监管、平台的责任担当、社会的包容理解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团结组织,四方协同发力,方能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行业生态,让技术进步真正惠及每一位劳动者。

[参考文献]

[1] Ķešāne, Iveta & Spurina, Maija.(2025).Theorizing autonomy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A study of food delivery gig workers in Latvia [J].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0.1177/00380261251330475.

- [2]Milkman,R.,Elliott-Negri,L.,Griesbach,K.,& Reich,A.(2021). Gender, Class, and the Gig Economy: The Case of Platform-Based Food Delivery.*Critical Sociology*,47(3),357-372.
- [3]YUSOF, A. B.M.,ARSHAD, M. M.& ISMAIL, I. A.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Gig Economy among Food Panda Delivery Services in Malacca, Malays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Business & Social Sciences*, 2022, 12(14):292-311.
- [4]Nagy,K.Freedom within Frames:the perception of paradoxical freedom among workers of the food delivery sector in Budapest[D].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Vienna, Austria,2022.
- [5]Derner,T.A.A True Delivery Hero?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eminization of on-demand food couriers in Sweden[D].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2021.
- [6]Robins,D.Invisible Migration and “Perverse” Capital: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Migrant Delivery Riders[J].*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025,59(2):1073-1097.
- [7]Timko,P.& Van Melik,R.Being a Deliveroo Rider: Practices of Platform Labor in Nijmegen and Berli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2021,50(4):497-523.
- [8]Nhat Xuan Mai,Duy Quy Nguyen-Phuoc, Bien Van Nguyen, Amjad Pervez, Oscar Oviedo-Trespalacios, Traffic crash risk among on-demand food delivery riders in Danang city, Vietnam: Key contributing factors[J].*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Volume 40,2025,doi.org/10.1016/j.tbs.2025.100995.
- [9]Moroane, K. Worker agency in the gig-economy: The case of food delivery gigworkers in Rustenburg, South Africa [D].Sol Plaatje University, Kimberley,South Africa,March 2023.
- [10]ALLEN-PERKINS,D.& CAÑEDO-RODRÍGUEZ,M.Weaving the algorithm:participatory subjectivities amongst food delivery riders[J].*Subjectivity*,2023,30(4):435-454.
- [11]Bonifacio,F.Cycling as a food-delivery rider. Or the difficult negotiation among speed, safety and accuracy[J].*Eracle*,2022,5(1):148-164.
- [12]Reyes,A.The porous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messages: Solidarity networks of Latin American food delivery workers in NYC[J].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2024,30(1):471-490.
- [13]Mendoca,P.&Kougiannou,N.K. ‘We Are Not All the Same’ : The Capacity of Different Groups of Food Delivery Gig Workers to Build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Power Resources[J].*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025,39(2):311-335.
- [14]Fernanda Pires, José M Tomasena, Martina Piña. Delivery riders’ cultural production in Spain: A thematic analysis of their self-representation on YouTube [J].*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Vol 30, Issue 1, pp.588-604.
- [15]Marrone,M.& Finotto, V. Challenging Goliath: Informal Unionism and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Food Delivery Sector. The Case of Riders Union Bologna[J].*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2019,12(3):691-716.
- [16]Gregory,K. ‘My Life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is’ : Understanding Risk among On-Demand Food Couriers in Edinburgh[J].*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020,35(2):316-331.
- [17]Christie, N.& Ward,H.Delivering hot food on motorcycles:the impact of business model on rider behaviour and safety [J].*SafetyScience*,2023,158.doi.org/10.1016/j.ssci.2022.105991.

作者简介:

马悦媛(2009--),女,汉族,北京人,高中学生,研究兴趣为社会政策。